

台前幕后

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昨天揭晓,而61位评委7月29日就已汇聚北京。六轮投票,从252部初选作品中选出80部,然后80进40,40进30,30进20,20进10,最后选出5部。这个过程,是波澜不惊还是针锋相对?本报记者独家采访多位评委,为您揭晓评选背后的故事。

真诚理性对待作品

目前的评选结果,用评委王鸿生的话来说就是“顺势而为,逐步达成”。最初的投票,相对来说评委没有出现太大的分歧,因为那么多作品,水平差距还是存在的。但到后来,无论是各组讨论还是会后私下交流,那么多评委对作品的看法就不可能完全一致了。“大家都蛮真诚理性的,虽然大部分都比较坚持自己的意见,但没有出现很激烈的冲撞,最后还是看投票结果。”

王鸿生说,总的来说,评委的判断是各方面综合因素的考量:题材、艺术处理、叙事能力等等,大家最后还是达成了共识。孙甘露亦表示,分歧存在,每轮大家都会反复讨论,“看法不同很正常,但评委间是互相尊重的。”

有分歧,但终达成共识

——多位评委为本报独家揭秘评选过程

据评委们透露,有些作品出现过起伏,但《江南三部曲》和《繁花》在后几轮的投票中表现一直非常稳定。

最终要靠文本说话

因为获奖者中不乏大腕作家,于是外界猜测,评委是否看作家不看作品?对此,接受采访的评委都否认了这种说法。

评委孙甘露很明确地回复记者:“看作品。”王鸿生亦坚定地回复:“不可能。”他说,这次参选的还有很多大牌作家,在一轮一轮过的时候,都被淘汰了,有些人连前十都没有进,排名还不及一些年轻作家,“最终还是要依靠文本来说话”。

评委陈晓明则表示,王蒙这次以耄耋之年夺得本届茅奖,并非只是出于评委们对他表达历史的尊敬之情,尽管这样的表达也合

乎情理,“根本在于,《这边风景》足以撑得起它独有的小说世界。”

准备充分风气改善

“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,我没有接到任何一个作家的电话。”虽无法了解全部情况,但在面对“是否有人私下通路子”的问题时,接受采访的评委们都一致地表示,没有。有评委告诉记者,今年的评委阵容确定得早,评委大部分都是职业评论家或大学教授,4年里,至少三分之一作品都已读过,书单也很早寄给了大家,给大家阅读的时间,这次评委的工作做得比较充分。

王鸿生说,这次评选纪律要求严格,社会氛围也在那儿放着,“在这个大氛围里面,作家们的自尊心和尊严感提高了,这一点是非常好的。”他说,过去一些文学奖评选中的不

良风气大家很不满,要改变这种风气,无论是评委还是作家们,各地作协,大家都应该有种尊重感,“我们要对文学负责”。

青年作家令人惊喜

在采访中,多位评委提到,年轻作家的作品令人惊喜。王鸿生表示,从目前的创作状况来看,长篇小说的总体水准提高了。前几轮被淘汰的作品,其实水平也不低。很多青年作家的起步非常高。颜歌、田耳等都出了一些很好的作品,其中有些年轻作家已经几度入围茅奖,看好他们将来的发展。

杨扬则表示,欣赏徐则臣的《耶路撒冷》,其他一些年轻作家,像鲁敏、乔叶等都写得不错。他们的作品有些是第一次进入茅奖的名单,初次露面,离得奖还有一定的距离,但他们的写作是朝上走的,值得期待。本报记者 夏琦



《江南三部曲》封面

聚焦历史中的个人

格非十余年借《江南三部曲》写所传、所闻、所见

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昨揭晓,格非的《江南三部曲》获得殊荣。得知消息后,格非向媒体表示,此前得知自己进入前十已非常满足。他说:“今天电话很多,身体又不太好。今天一过,大家还是该干嘛就干嘛吧。”说起《江南三部曲》的创作初衷,他透露:“我想描述中国近现代百多年来的历史中的个人。我当然不是想去描述历史,对这个我没有任何兴趣。我想描述的是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中,个人是什么样的。”

三部小说 一脉相承

《江南三部曲》中,《人面桃花》写的是民国初年知识分子对精神世界和社会理想的探索,《山河入梦》写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梦想和社会实践,而《春尽江南》则将目光瞄准了当下中国的精神现实。

在这三部小说中,有很多一脉相承的东西,很多人物和地点都会重复出现,这些人物和地点在现实中也有原型,“只不过没有具体的个人,而是我经验的综合。鲁迅先生也说过,

不可能把一个人原封不动地放到小说中去,我可以选择不同人,不同的片断,不同的性格,不同的手势、习惯、语言方式,这是每个人的经验,这些经验在我的记忆中储存着,在写作的过程中就会跳出来,我也不知道具体是谁,但是一定会有原型。”格非说。

“交流”结束 回归平常

从上世纪90年代起,格非耗时10多年创作了《江南三部曲》。在格非看来,《江南三部曲》在他的创作生涯中是比较特别的,主要原因是创作期间他一直在大学教书,抽出一段时间来很不容易。对于读者的阅读感受,格非保持着一颗平常心:“写作是读者与作者的交流,我的书写完之后,交流在某种程度上已完成了。因此小说也就与我没有关系了。”

上世纪80年代那股对先锋文学的“狂热”似乎已一去不复返了。在格非看来,“与其说读者的文学素质下降了,还不如说他们对文学的关注程度下降了。全世界都是如此。但读者的



作家格非

减少、文学市场的不景气并不表明文学已丧失其存在的理由。对于那些追寻生活意义的读者而言,文学作品永远是寻求认同,寻找对文化境遇共同感知的重要途径。就作家而言,对于可能的读者量也应当持开放的态度。一千万不算多,一个也不算少。”

作为一位身处高校的作家,格非如今十分关注年轻人的创作:“我关注的是70后、80后、90后,我在学校给他们教书,学生有很多习作,我觉得年轻人的作品很坦率,比我们这一代人更少伪装,表达方式虽然幼稚,但我看好他们的品质。” 本报记者 乐梦融

创作谈

□ 格非

给我2000法郎,总愿我不如换个地方,于是我就去罗马和那不勒斯游玩,一个月后提前回国。《人面桃花》写了个开头就搁下了。

好在第二年学校派我去韩国的庆州授课一年。除了应付轻松的教学任务之外,尚有余暇用来写作。不管怎么说,那个只有十万人的庆州古城,给我的写作提供了适宜的氛围,《人面桃花》在回国前就顺利写完了。

在以后的几年中,学校的事情越来越忙,朋友们偶尔问起第二部什么时候写,我总是开玩笑说,那要看学校何时再派我去韩国。韩国虽然没去成,但在《山河入梦》写完第三章之后,我去了一趟台北,在世新大学讲学两个月。在那里开始写作的第四章,叙事速度明显加快。

《春尽江南》的写作持续了一年半,跨度却长达二十年。从《人面桃花》到《山河入梦》,再到《春尽江南》,故事钟摆的振幅越来越小。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,是时间本身正在褪去它原有的光晕…… (本报有删节)

五位作家眼中的获奖作品

●金宇澄的《繁花》是用上海方言写成的长篇小说,用大量人物对话的形式描述了分别出身于资本家家庭、军人家庭、工人家庭的三个普通上海市民的成长经历,时间从“文革”前到2000年后,登场人物众多,叙事在时空里频繁交替。金宇澄说:“《繁花》可以卸掉包袱,做轻松的过滤,做一份清汤,至少表面上可以这样讲,我不施加迷雾、文艺糖精片,只讲口水故事、口水人——城市另一个夹层,这些被疏忽的地带。”

●格非的《江南三部曲》(《人面桃花》《山河入梦》《春尽江南》)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酝酿构思,沉潜求索,到2011年终于完成定稿的系列长篇巨作,呈现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内在精神的衍变轨迹。格非说:“我并没有完全抛弃现代先锋,而是希望把它融入一个更大的传统,进入更加宽阔的地带。”

●王蒙的《这边风景》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作家下放新疆农村劳动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,因各种原因以前未曾付梓,但在《王蒙自传》和各版本评传中都有所提及,因而是一本早有耳闻却迟迟未露面的小说。王蒙说:“从对人性和生活的描写来说,《这边风景》在我的作品里,可以说是最具体最细腻最生动最感人的,从头到尾都是掏心窝子的真情实感,这是我今天再也无法抵达的写作状态。它使我在最困难时回到写字台前,使我增加了写作的自信。”

●李佩甫的《生命册》采用放射结构方式,从一风、一尘、一树、一花写起,书写了整个平原上的各种风土人情、地理环境及一个村庄五十年的生存状况,可以说是一部自省书,也是一个人五十年的心灵史。李佩甫说:“乡土文学担负了记录历史的责任,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,让我们的后人知道祖先是踏着什么样的足迹一步步走到现在的。”

●苏童的《黄雀记》延续了他惯常的小人物、小地方的叙事风格和节奏。故事并不复杂,就是一桩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青少年强奸案。分为三章:保润的春天、柳生的秋天、白小姐的夏天——三章的标题暗示了三个不同的叙事视角。苏童说:“我的一部分写作行动,可以说是一场持续的‘造街’行动。造的当然是香椿树街。这次的《黄雀记》,是造街行动的一项大工程,我借《黄雀记》探索香椿树街的魂灵。” 鲁明 整理